

闻有所得

## 肝胆怀仁写春秋

王一彪

认识谭仲池，是在他做地方领导干部的时候。拜读他的文章，多是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专栏上。看到谭仲池最新出版的诗文集《故乡与大地》，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和敬佩！诗文集所收录的均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散文与诗作，这些作品以真挚情感打动人心，以质朴语言彰显魅力，以人文关怀传递力量，一如既往地践行着谭仲池坚守的文学使命。

囿于自己有限的文学修养，相较于诗歌我更关注散文。谭仲池的散文已然形成自己的风格，擅长在追溯历史人物、探寻故土文脉中，将个人的生命感悟与民族的精神记忆巧妙连接在一起。这些作品不是简单的史实复述，也非浅尝辄止的景物描摹，而是饱含作者对苍生的悲悯、对民族的赤诚，字里行间流淌的文史感悟与家国情怀，构成其散文最动人的精神底色，用谭仲池自己的一句诗来概括那就是“肝胆怀仁写春秋”。

这种底色在《书剑肝胆托昆仑》一文中尤为突出，谭仲池内心所寄寓的家国情怀，通过对谭嗣同故居的细腻探寻和文字表达得以具象化。文章未停留在对青砖黛瓦、笔墨纸砚的表层刻画，而是以所睹景致为切

点，精准阐述谭嗣同“书剑肝胆”背后的精神内核，并将作者的情感与思考融入其中，从而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由书房的陈设联想到少年谭嗣同“读书击剑”的不同凡响，那份对学问的执着、对天下的关切，恰是作者文学思绪远航的起点；再由厅堂的格局追忆谭嗣同投身变法的决绝，引发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深刻解读，让读者在作品中品味到的不只是仁人志士的铁血风骨，也饱含作者对家国命运的理解与担当。

这种“以物载情、以史寄怀”写法，让静态的景与物成为民族精神的载体，也让抽象精神层面的仁心与担当变得可感可触、可亲可敬。这份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精神境界的精准描绘与深情赞颂，恰恰源于谭仲池对家国情怀的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这种对仁人志士的当代追思，在《倚剑望昆仑》中得到进一步延续和拓展。谭仲池笔下刻画和诠释的家国，并非局限于几篇作品，而是贯穿于《故乡与大地》诸多文章中。

《守望橘子洲》以橘子洲这一承载红色记忆的地标为切入点，将湘江涛声、橘洲景致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融通起来。文字呈

现的是橘子洲的四季变换，内在蕴含的是民族救亡图存的岁月沧桑；文章赞颂的是橘子洲头的精神气象，作者抒发的是革命先辈的怀仁之举与家国担当。在《国歌依然在故乡回响》中，聚焦国歌背后的故事，通过追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历程，描摹故乡人民对国歌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文章既写人民音乐家聂耳“以音乐为武器、以热血为音符”的创作初心，又写故乡人民对这种爱国精神的坚守与践行，将个人情怀、故乡记忆与民族精神紧密绑定，这种对革命历程、文化名人和家乡人民的深情书写，正是怀仁之心的延伸。

谭仲池这类散文创作，始终坚持以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让历史人物的精神得以传承，让红色地标的记忆得以延续，让民族精神的力量得以彰显，进而在读者心中引发强烈共鸣。

谭仲池肝胆怀仁的散文写作，也体现在对故土的深情眷恋与对民生的深切关注上。在《浏阳河边是家乡》《故乡的小溪河》《不忘家山水》等作品中，以浏阳河为情感纽带，将河水的流淌与故乡的变迁、乡亲的冷暖紧密相连——他写河畔的烟火日常，写乡亲们的勤劳善良，写故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谭

仲池的笔下，浏阳河是一条精神的河流，承载着他对故乡的热爱、对乡亲的悲悯、对乡土文脉延续的牵挂。其文字不刻意煽情，却总能于平淡中见真情，在细节处蕴深意。

谭仲池肝胆怀仁的散文写作，还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关怀与责任担当上。他的文学思考与文字表达并没有局限于个人，而是始终关注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发展脉搏紧密相连。在其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对城市发展的深度思索、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切担忧、对民生百态的深情关注，这些都体现了谭仲池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用文字表达记录时代，用文学思考回应关切，既不回避现实中的问题，又始终传递着正能量。这种“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让谭仲池的诗文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从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

披肝胆胆，仗义怀仁。我期待谭仲池奉献更多更好作品，一以贯之坚持以文字为桥梁，把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过往与未来连接起来，让读者在品读隽永文字的同时感悟生命本来的意义和时代赋予的使命。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 一本湖南作家的「观察手记」

余三定

袁姣素的文学评论集《春风有度，洞见思想：新时代文学研究辑录》(重庆出版社2025年7月第1版)收入作者近些年撰写的关于阎真、王跃文、刘庆邦等湖南著名作家的若干评论，是关于湖南新时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袁姣素文学评论的特点是重点突出，善于揭示评论对象的突出特点和内在蕴含，善于概括评论对象的创作风格、个性特点和语言特色。

书中第一辑为“阎真长篇小说研究”，对阎真的《曾在天涯》《沧浪之水》《活着之上》《因为女人》《如何是好》等5部长篇小说都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到的评论，着重点放在其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深入分析上。袁姣素对阎真长篇小说总体面貌和基本特色做了如下概括：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与情感尴尬是阎真小说中一道独特又别致的风景，她们在生存线上痛苦挣扎，在情感的路途中迷茫无奈，在生活的夹缝中坚守心灵的净土和良知。如《如何是好》中的许晶晶，她保研落选，情感又无处归依，背负着双重压力的许晶晶陷入了一种精神与肉体的深深绝望中。许晶晶有过内心的矛盾与抗争，撕裂的痛苦与绝望，但她不屈从命运，最终还是倔强地杀出一条血路，扼守住了人格尊严与底线。作者这里对许晶晶性格和命运的剖析是非常到位的。

第二辑为“王跃文小说探析”，对王跃文的《国画》《大清相国》《漫水》《爱历元年》《家山》等长篇小说进行深入评论，着重在对王跃文作品的深刻社会内蕴、社会意义进行挖掘。从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上看，王跃文是敢于叩问时代、抨击丑恶的。作者分析指出：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上，王跃文的《国画》在社会转型时期横空出世，纵横着深刻的时代脉络；《大清相国》借鉴历史警示后人，在基墨尘上的现代社会，具有古风长存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意义；《漫水》由内而外散发一种悠远的乡村意味，具有丰富的地域传统文化特征与特定的时代语境特征；《爱历元年》用一对夫妻的感情与现实生活，展示出20世纪国人的精神走向，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欢喜悲苦，爱恨情仇；《家山》的诗品格体现在由一个村落的兴衰呈现出整个国家的新旧制度更迭与发展的过程，以老一辈的贤明通达，衬托出后辈青年的敢作敢为，新老帮扶，戮力同心，作品用时代新风刷新偏远村落，写出山乡巨变的历程。

第三辑为“刘庆邦散文解析”，对刘庆邦的《涟水谣》《自然抵达》等6部散文集进行细致的赏析、评论，着重在对刘庆邦散文所描写的作家自己的心路历程、情感世界进行阐述、分析。作者认为，刘庆邦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以小的切口，再现大世界中的人情冷暖，世情风情。刘庆邦的散文呈现出他个人的卑微与凄凉，甚至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与批判。这种真诚的自觉与自省，以及执拗地突出真实情感与事实的个性叙事，是刘庆邦散文的一大特色。而刘庆邦认真、较真、真诚、倔强的个性在他的作品里展露无遗。刘庆邦散文的语言看似散漫，未经雕琢，却有属于自己的个性魅力，从里至外，于心而溢，行文走笔，都弥漫着一股朴拙之气，憨厚之态。这里对刘庆邦散文的分析、理解和总结，抓住了其特色和特质，很得要领，很见深度。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原院长)

## 打捞湖湘抗战历史中的英雄少年

陈燕

儿童历史小说《听火》以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为背景，以真实存在的“长沙抗战儿童剧团”为原型，讲述了一群少年在烽火岁月中，以文艺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故事。这部作品的创作缘于对一群几乎被遗忘的湖湘英雄少年的发掘，作者采用典型的线性推进方式，借由主人公水生的成长轨迹，串联起剧团从成立到撤离的全过程。在这一叙事框架下，《听火》不仅还原了历史肌理，还完成了对战争中“少年何为”的文学应答。

## 线性叙事的情感张力

线性叙事作为传统叙事手法之一，以其清晰的时间顺序与逻辑推进，尤其适合表现历史进程中个体或群体的成长轨迹。在《听火》中，作者以水生从失聪孤儿到剧团骨干的转变为主线，呈现了剧团成立、街头演出、联合公演、募捐献金乃至最终撤离长沙等关键事件。

不同于历史小说惯常采用的展现多城空间的“迁移式叙事”，《听火》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长沙城中，展现时间的流动与人物命运的变迁。作者在后记中说：“……诞生于大后方的长沙抗战儿童剧团在管理上相对松散，没有活动的时候，团员们各自学习和生活，活动范围也比较有限。”正是这种“在地性”，使故事只能在有限时空中展开，却也因此强化了读者对特定历史现场的感受力。

## 虚实结合的历史建构

创作历史小说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听火》在这方面表现出严谨的态度。



从后记中列举的如《抗战儿童：儿童剧团纪念集》《烽火童年：纪念广州儿童剧团成立七十周年》《侵华日流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研究》《长沙文史资料》《老长沙：潇湘梦痕》等文献资料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对“长沙抗战儿童剧团”的成立时间、人物原型、活动内容等进行了细致考证，还参照了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类似的儿童团体与历史情境，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当时长沙的城市风貌、社会百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听火》借助剧团这一历史实体，通过人物的行动，在有限的时空中展开密集的历史叙事。这种“以史料为基”的创作态度，使作品具有坚实的历史真实感。

## 何为“方志体长篇小说”

龙喜平

面对当代长篇小说浩如烟海的创作，批评何为？是如观光客般浮光掠影，还是如勘探者般向深处掘进？晏杰雄的长文《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正是一次沉潜而有力的学术勘探。经过对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全面观照，晏杰雄提出“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概念，为读者理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提供了有益参照。

在此之前，方志体在评论中已偶被提及，但常常失之宽泛，但凡涉及地方风物、线性历史的作品，都有可能被贴上这个标签。这就像把各式各样的容器都称为“碗”，而忽略了它们的独特性。晏杰雄所做的，是为这“碗”测量口径、深度与弧度。他严格界定了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的核心特征：它必须真正承继古代方志“横分门类，纵述历史”的体例基因，以系统性的空间结构取代传统的线性叙事，其目的不仅在于讲述故事，更在于为一方土地立传，建构一部文学化的地方整体史。

晏杰雄不仅命名了一种文学现象，还深入阐释了这种现象何以在此时蔚然成风。他敏锐地指出，这是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作家们“为故乡立传”的深切情感需求，与本土传统叙事资源的一次创造性相遇。当线性史诗略显疲态，蕴藏于古老方志中的空间化、百科全书式结构，便成为作家们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凝聚地方经验的富矿。更具洞见的是，他揭示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内在肌理：作家们绝非简单复古，而是以现代小说意识、社会科学视野及日常生活美学，对传统体例进行了三重转化，包括赋予其现代空间小说的质感与张力，以“博观约取”的描述取代“博观约取”，在非虚构的史传笔法中融入虚构的、多元的文学语体。于是，我们看到霍香结如何以人类学知识显微镜般凝视一枚青果，林白如何以个人记忆的光晕浸染故乡的草木。在古老方志的躯壳中，跃动的是属于21世纪的

文学精神。这种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文体比较，进入了文化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深层逻辑。

可贵的是，在评介新时代方志体长篇小说时，晏杰雄的笔触饱含着一种地方文学关切。在80年代代表作中，他将姜贻斌的《火鲤鱼》、蔡海海的《地方》、彭东明的《坪上村传》这3部湖南作家的作品，纳入这一潮流进行讨论。这不仅仅是研究样本的扩充，更是一种本土文学声音的彰显。晏杰雄以严谨的学术框架，将这批书写湘地风物人事的作品，置于一个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文体创新潮流中予以肯定。这无异于为湖南文学发出了清晰而响亮的学术声音，使那些深耕于一方水土、执着于为故乡立传的作家，不至于被遮蔽，不至于沉寂下去。这让我们看到，文学的活力正蕴藏于各具风貌的地方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

香闲情

最近我的书架上多了一本好书：湖南本土作家罗少亚的长篇小说《铁腕掬相王安石》。这本书今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书名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仿佛那位千年前在朝堂上披荆斩棘的改革家，正要“破壁而出”，与今天的我们对话。

## 一个有血有肉的“拗相公”

朱敏

翻开这本书，你会立刻被那些生动的小标题吸引：“捏碎一个又一个核桃”“穷得连赏钱都拿不出”“朝廷养梁骨缺钙”“藐视朕年轻无能”“大家一起病吧”“王韶解声如雷”……这哪里是想象中枯燥的历史小说？分明是一场沉浸式的“北宋变法剧本杀”！

读罢罗少亚女儿罗潇湘《我家85岁的宝藏老头》一文，不由得对罗老心生敬意。一位老人，在腰椎手术后拄着拐杖，走访全国多处王安石故地和博物馆，用40年光阴打磨一部作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热爱与坚持的感人故事。

罗老笔下的王安石，不再是历史课本里那个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敬的人。他会因思考政事只吃眼前菜，被御厨误会“只爱獐子肉”；他退回下属为治他喘疾买的紫团参，有意压低女婿官职，将夫人所买贫女无偿送回并资助其还债；他身居相位却不坐轿、不纳妾、不蓄私产。长女夭折，他往山野吟诗作别；儿子急躁，他耐心教导修心养性，甚至将被儿子虐待的儿媳另嫁他人，所谓“拆散一对，和合四人”……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细节，让尘封千年的历史人物重新有了温度。

## 一套经世胆识的治国方略

罗老用通俗笔触，为千年前的改革新政注入了现代质感。

青苗法，堪称大宋版“农业供应链金融”。农时青黄不接之际，官府主动出借钱粮，待秋收后再让农民加少量利息归还。

市易法，犹如古代版“物价平准基金”。政府在商品价贱时收购囤积，避免“谷贱伤农”；在物价暴涨时平价抛售，遏制大商人囤积居奇，还为中小商贩提供贷款周转，可谓一举三得。

募役法，则是一场劳役制度的革新。它把百姓必须轮流承担的劳役改为“交钱免役”，并向原来免役的官绅征收“助役钱”，既减轻了百姓劳役负担，也让官府办事更高效，还能增加财政收入。

读到这里，你会恍然大悟：原来千年前的北宋，早已在探索这些现代经济与社会治理理念。

## 一段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这本书里有很多出场人物，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生动刻画了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历史人物之间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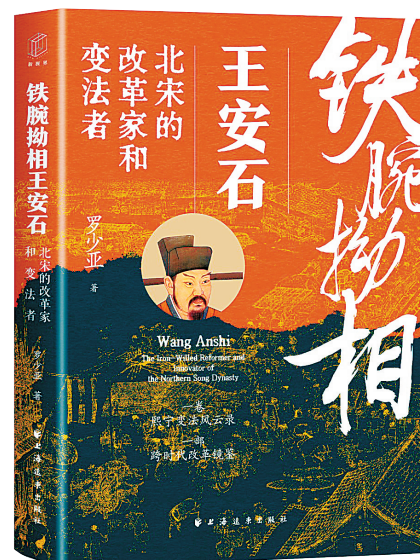
他们是对手，亦是知己。三人皆怀济世之心，虽政见势同水火，却始终坚守君子之道。王安石支持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苏轼被诬入狱时，王安石极力开脱；后来苏轼亲见新法益处，到江宁探望辞别的王安石，慨叹“从公一觉十年迟”。

终究是时代弄人，王安石变法被废、抑郁而终，司马光废新法后次年便病逝，苏轼则夹在党争中半生颠沛，三位贤者皆未能实现治世理想，只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回响。

这些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关系，让我们看到：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而是充满无奈与选择的复杂图景。

为什么今天还要读王安石？我想，或许是因为，改革不是某个时代的专利。每个变革者都会面临相似的困境：既得利益者的阻挠、社会惯性的掣肘、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罗少亚在前言中写道：“归来仍是王者，王安石是个大写的儒者、圣贤！唯情最长久，王安石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依然炽热如茶，滚烫人心。”这句话，何尝不是他“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治学精神的生动写照呢？



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映照